

主體，當代思潮中「互為主體」的要求和企盼也是植基於人的尊嚴，生命權及自我實現的發展權，是人人同享的平等價值觀。儒家在社會公利的追求上，應隨著時移物轉而予以調整。在專制政體時代，社會公利之能否實踐操之於大權在握的君王，這是歷代關心社會的儒者不得不對君王進行一廂情願的道德勸說之原因。台灣目前已是逐漸成形的民主社會，對公義社會之深層理解及努力不懈的建構，才是有儒家心懷的學者對義利觀之公共利益（大眾福祉）向度，應聚焦的焦點。

## 中國文化的綜合創新 ——對張岱年提案的考察

程煉

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

張岱年先生（1909——）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在世哲學家之一，他的學術生涯始終圍繞著三個主題：哲學理論問題的探索、中國哲學史的闡釋和文化建設問題的研討。作為當代中國哲學領域裏少有的幾位創造出哲學體系的哲學家之一，張岱年先生的思想有非常突出的特點。我曾經在其他場合描述了這些特點：

展現了對真理與道德的激情，展現了對廣泛的人類價值的合併能力，展現了對自己的文化和同胞的需求和前途的深深關注。<sup>1</sup>

1 Cheng Lian, "Zhang Dainian: Creative Synthesis and Chinese Philosophy", in Chungying Cheng & Nicholas Bunnin (eds.), Blackwell Guide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Blackwell, forthcoming.

本文中將要討論的文化觀是張岱年的持續興趣，貫穿他的全部學術生涯。他的中國文化觀在近 20 年來的文化討論中逐漸成為顯學和主角，被稱為「中國文化的綜合創新論」。

本文的興趣主要是規範性的，而非歷史的。對各種觀點（包括張岱年自己的觀點）進行歷史淵源、沿革和演變的揭示不是本文的目標。我將簡述張岱年先生在文化討論中提出的文化觀，然後指出這種觀點留下的一些未決問題。我相信，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探索，有助於我們理解和評價張岱年的文化提案。

自張岱年的早年起，一系列文化危機撞擊著中國知識份子的心靈。五四運動為種種文化觀的競爭提供了舞臺。張岱年像他的大部分前輩和同輩一樣，並不是在追求一種一般性的、關於何為文化的哲學理論，而是面對一個在他們看來更為急迫的問題：要再鑄富強，中國應該發展一種什麼樣的文化？五四運動為各種文化觀點的競爭提供了舞臺。在種種提案中，最著名的當屬全盤西化論和復興國粹論。張岱年對兩者都不滿意，認為它們都會導致中國文化的毀滅。他在 30 年代就參與了文化論戰，在一篇題為〈關於中國本位文化的建設〉的文章中，他寫道：

要保持舊文化，不思與世界文化相適應，結果必歸於絕滅而已；同時，如根本唾棄本土文化，要全盤接受外來文化，亦終必為所同化而已，其自己的文化也一樣歸於絕滅。所以，在現在中國，全盤接受西洋文化與謀舊文化之復活，同樣都是死路一條。<sup>2</sup>

要脫離這個困境，張岱年提出的辦法是「兼綜東西兩方之長，發揚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遺產，同時採納西洋的有價值的精良的貢獻，融合為一，而創成一種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調和，而要作一種創造的綜合。」<sup>3</sup>這

2 〈關於中國本位文化的建設〉，《張岱年全集》第一卷，頁 230。

3 同上，頁 229。

個觀點是張岱年一直堅持的，並在近 20 年的中國文化論爭中得到廣泛注意，被稱為「中國文化的綜合創新論」。在 80 年代的著作中，他進一步強化和充實了這個觀點，並指出這條綜合路線應該採納的方針。

在張岱年看來，重要的問題不是綜合哪些東西，而是如何綜合。在〈中國文化的發展的道路：論文化的綜合與創新〉一文中，張岱年詳細地討論了如何從天人觀、價值論和思維方式三個方面綜合中西方文化的優點。首先，從人與自然的關係上看，張岱年如下概括：

中國古典哲學宣揚人與自然的統一與和諧，西方近代思想鼓吹人與自然的對立和鬥爭。

當然，他也承認，「中國亦有肯定『天人之分』的思想家，西方亦有重視人與自然的融合的思想家。」因此，他斷定，「將『天人合一』與『戰勝自然』的觀點結合起來，這是理之當然、勢之必至。」

接著，張岱年指出中西價值觀方面的綜合。價值觀在他看來，無非涉及到個人與集體、物質利益與精神追求的關係問題。

思想家中，或者專重精神生活的提高和國家社會的利益，或者強調個人的權利與自由。事實上，個人於社會、民族是不能相互脫離的，人們的物質利益與精神生活亦是相互依存的。儒家的禮教束縛了個人自由、忽視了個人應有的權利，必須加以批判；但是儒家高揚道德義務及社會責任心，還是必須肯定的。西方強調個人奮鬥精神、個人獨立意識以及公平競爭原則，值得我們學習。而現代西方社會中流行的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非理性主義思潮，對於促進社會發展並無裨益，是不應該盲目效法的。<sup>4</sup>

4 張岱年〈中國文化發展的道路——論文化的綜合與創新〉，《張岱年學術論著自選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頁 599-600。



第三個方面的綜合是中西思維方式的綜合。張岱年觀察到中國人擅長辨證思維但弱於科學和分析思維。他的提案是將辨證思維與分析思維結合起來。最後，他總結說，綜合是一個不斷進行的過程。

中國新文化的創造，應會綜合人類已經發現的一切相對真理，達到已知真理的會綜，同時開闢認識真理的廣闊道路。真理不斷發現，文化不斷更新。<sup>5</sup>

張岱年的立場，就其本意而言，希望達到某種精微之處。它不想在激進和保守的觀點之間取平衡。張岱年認為這兩種觀點沒有任何正確之處。他說，綜合中西文化之長以創造新文化，不是要對中西文化東取一點，西取一點，勉強拼湊起來。他尋求的綜合是一個新的完整的文化的創建，是一個不停地吸收新真理的事業。在我們細緻考察這個思想之前，它在直覺上的確有很大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釋它何以成為當前中國文化討論中的正統觀點。與全般西化論比較，張岱年的文化觀似乎維護了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即反對文化建設中的奴性和民族虛無主義。與復興國粹論相比，張岱年的文化觀強調了文化建設的開放性，即反對故步自封和抱殘守缺。

如果對這種文化觀做一個分析，我們會發現一些未決問題。首先，我們考察一個一般性的問題。文化的綜合應該取長棄短、去偽存真，這句話總是對的；就象父母教育孩子說，「你要學好人，不要學壞人」。但這樣講本身沒有什麼信息量，除非我們對孰長孰短、孰真孰偽有一些認識，除非父母給孩子指點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即使張岱年反對的兩種文化觀，也未見得反對取長棄短、去偽存真的大原則。它們之間更嚴肅的爭論恰恰發生在那些東西是好的、哪些東西是壞的這個層次的問題上。對文化以及文化中的要素做價值上的判斷是一個大難題。文化相對主義就反對任何這類判斷。有趣的是，張岱年以及他所反對的兩派觀點都不持有文化相對主

<sup>5</sup> 同上，頁 601。

義的觀點。一個文化是一個群體長期生活在一起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成熟的生活和思維方式，其哲學、宗教、文學、藝術、風俗等構成一個整體。一個文化包含的價值觀具有強大的穩定性，其內核有免受外部判斷的特性。也就是說，某種程度的文化多元態度是必須的，一個文化的優缺點不能直接從與另一個文化的直接對比中得出。同樣，由於一個文化的整體性，其一部分元素總是與其他部分緊密聯繫，取捨並不容易。因此，文化比較要求具體和細緻的分析工作。

第二個問題是綜合中的相容性問題。張岱年提出的三個方面的綜合面臨著不同程度的相容性問題。例如，他提出「天人合一」與「戰勝自然」的觀點的結合。張岱年說：

西方近代強調戰勝自然，把自然看作敵對的力量，其結果出現了破壞生態平衡的偏弊。中國哲學強調天人合一，在改造自然方面效果不大，在保持生態平衡上卻有重要意義。<sup>6</sup>

這段話有些含糊的地方。我們不清楚張岱年是否認為今天生態環境的破壞是「戰勝自然」思想的必然結果。如果是的話，如果「天人合一」的思想蘊涵著對生態平衡的保持的話，那麼這兩種思想就包含不相容性。在關於個人權利與社會利益的討論中，張岱年提倡兩者都應該受到重視。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更深刻的問題是當兩者衝突的時候，我們應該為了社會利益犧牲個人權利還是應該以個人權利為上呢？最大的不相容似乎在辨證思維與分析思維的結合中。辨證思維遵循辨證邏輯，分析思維遵循形式邏輯，而相容性只是形式邏輯中的要求。張岱年並沒有指出什麼構成辨證思維與分析思維的成功結合，我們如何達到它。

第三個問題，或許最重要的問題是這樣的：假定我們通過綜合創新而形成了一個全新的文化，在什麼意義上這個文化可以稱為中國的文化或者

<sup>6</sup> 張岱年〈中國文化的思想基礎與基本精神〉，《文化與哲學》（教育科學出版社，1988），頁 3

說，如果人類已經發現的全部真理是我們在綜合創新過程可資利用的全部資源，那什麼使得綜合的產品是中國特色的產品。如果有人回答說，這個新文化是中國文化，是因為它的創造者是中國人，這樣的回答是不充分的，因為即使一個主張全盤西化的人也可以類似地說自己是中國人。綜合創新得到的文化要成為中國的文化，必須具備中國文化的本質特點。會綜合人類已經發現的一切相對真理，應是全人類的任務，這項任務本身不足以保證被創造的新文化具有特殊的民族性。

當然，張岱年明確注意到這個問題，明確提出文化建設中必須保持民族主體性。他說：「中國新文化應是中國優秀傳統與西方先進成果的綜合。」<sup>7</sup>既然綜合的兩大要素之一是中國優秀傳統，那麼新文化當然具有民族性。張岱年不是文化相對主義者。張岱年認為，西方文化在總體上優於中國傳統文化。<sup>8</sup>這個文化判斷與張岱年的整個哲學體系相關。從哲學上看，他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始終堅持唯物論，讚揚辯證法。他的中國哲學史闡釋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是揭示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他認為這些體現了中國古典哲學的優秀傳統。因此，我們不難理解他是這樣理解他心目中的中國新文化的「馬克思主義學說是西方文化精粹的結集。所以，中國新文化的主導思想應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優秀傳統的正確思想的綜合。……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優秀傳統的結合，這是唯一正確的方針。」<sup>9</sup>因此，在張岱年的綜合創新文化觀中，對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的利用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民族主體性不是獨立於這個指導原則之外的。

以上三個問題分別涉及到張岱年文化提案中的具體性、相容性和民族性問題。我相信，要發展和充實張岱年先生的「綜合創新論」，這些問題

7 張岱年〈中國文化發展的道路——論文化的綜合與創新〉，《張岱年學術論著自選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頁601

8 張岱年、程宜山《中國文化與文化論爭》（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頁392

9 張岱年〈中國文化發展的道路——論文化的綜合與創新〉，《張岱年學術論著自選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頁601

需要從理論上加以解決。我同時相信，任何關於中國文化建設的討論都必須關注這些問題。

## 邏輯學的「原汁原味」

## 與理則學的「中西雜糅」

邢滔滔

北京大學哲學系邏輯室副教授

張岱年先生所著《大眾理則學》的開篇處，表達了一個宏大的理

想：「中國文化有三個淵源，希臘的邏輯、印度的因明、中國的名學，各居其一。……應當合治於一爐，以成大一統的理則學，自是理則學應有之義。」

其價值在今日東西方文化相互借鑒、彼此融合的背景之下，顯得更加彰顯，在此不須贅言。但此理想之成立，卻需要學者的學力、異質文化的衝突、與政治經濟有關的「話

語權」等條件。張先生此處用語，將邏輯、因明、名學三者並列，又於其上總結出理則學一詞，其意似乎以邏輯學（或主要稱呼）為基礎，以因明、名學為補充，亦大體沿襲這一用法。本文將就這一用法，